

基于金融包容视角下的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JIYU JINRONG BAORONG SHIJIAOXIA DE
WOGUO CHENGXIANG SHOURU CHAJU YANJIU

蒋满霖◎著

非
外
借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本专著受资助课题：2017年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课题，基于金融包容视角下的广西少数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实证研究，批准号——17FMZ015。

基于金融包容视角下的我国城乡 收入差距研究

蒋满霖 ◎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基于金融包容视角下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 蒋满霖著.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643-6238-6

I. ①基… II. ①蒋… III. ①居民收入—收入差距—城乡差别—研究—中国 IV. ①F1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9733 号

基于金融包容视角下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研究

蒋满霖 著

责任编辑

左凌涛

封面设计

严春艳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二环路北一段 111 号
西南交通大学创新大厦 21 楼)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9.5

字 数 350 千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6238-6

定 价 89.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前 言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有 5000 年历史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温家宝总理曾引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来表达对农村建设的关切。“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个民族都不能少。当前，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三农”问题又衍生出“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地”这一“新三农”问题。当农民作为一种职业时，农业与农民产生了联系，同样的当农民作为代表居住生活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的人群，农村与农民联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农业和农村是作为农民生存的具体载体的附着其上的次生性问题。因此，中国“三农”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多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的综合体。

农村改革既是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时间起点，也是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1978 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起步，进而向城市推进。40 年来，中国农村在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持续快速发展，农村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农民人均收入由 1978 年的 133.6 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13 432 元，“三农”发展成绩举世瞩目。然而，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翻天覆地”之下，农民增收难，农业基础薄弱，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发展不均衡凸显，若将城乡人口所占比重及各种社会保障因素计算在内，这一差距会更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会阻碍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也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威胁，在此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课题。

中国共产党一直关切“三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早在 1978 年就率先提出对农村进行改革，以解决占总人口 80% 的农民的吃饭问题。2018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是“三农”，这是本世纪以来第 15 次连续将一号文件锁定于“三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脱贫攻坚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党的十九大又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这为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描绘了美好蓝图。2018 年恰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目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凸显，主要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在要素流通和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中应重点考虑。1991年，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26年后的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金融活，经济活”的精辟论述。由此，本专著重点选取了我国西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中部的湖南省两个农业大省为样本（以更接近中国的实际），从金融包容的视角，通过优化金融生态，提升区域金融竞争力，实现普惠金融的常态，勾勒破解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途径，实现乡村振兴。

金融包容对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改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影响。在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上，联合国首次提出金融包容这一概念，倡导通过建立包容性的金融体系帮助低收入群体获得金融服务，提高其收入水平。焦瑾璞（2006）首次把金融包容这一概念引入中国，提出所有群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都应该有机会获取并使用金融服务。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中所涉及的群体重点在农民、小微企业（特别是新设创立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和其他特殊群体。因此，在广西和湖南这两个集“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山区、落后”等于一体、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的地区来说，利用金融包容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有着更深刻的现实意义。为了探讨金融包容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具体效应和影响，本书在总结前人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了广西和湖南两地金融包容水平发展的实际情况，利用2010—2015年的数据，通过构建金融包容指数来测量金融包容水平并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与此同时，利用面板数据对金融包容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进而测度其金融生态和区域金融竞争力，并就此提出合理地发展包容性金融体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本书以独特视角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诠释“农村金融包容”，通过制度创新框架来优化农村金融生态，旨在破解城乡收入差距，为剖析“三农”提供新的研究范式。本书原创性地给出了一个包括观点、方法和政策的较科学的农村金融包容理论框架。创新意味着风险，研究也许不够精致，但以期能为乡村振兴的研究独辟蹊径。

在中国，研究“三农”几乎永不过时。从国外实践看，“三农”也长期存在过。西方国家政府在完善制度的前提下，都不遗余力对“三农”进行扶持，农

村金融几乎就是“政策性金融”。当然，国外的经验并不能简单借鉴，但他们对“三农”的偏爱态度和对城乡平等的尊重，却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同时，金融包容水平是可以评价的。中国的东部、中部和西部的诱导性的制度创新框架应该有一定的差异性。这其中居最核心的是价值观层面的文化。在中国，我们应该从思想深处尊重城乡的平等性，同时，在全社会积累出城乡平等的价值观。

笔者将“从金融包容的视角，通过优化金融生态，提升区域金融竞争力，实现普惠金融的常态，勾勒破解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途径，实现乡村振兴”这一逻辑通过本书表达出来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抛砖引玉”。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后，有所启发，从而一起推动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与破解工作。

本书是几个省级课题的成果，也是集体智慧和工作的结晶。感谢王艳红硕士、李慧平硕士、基建处李蓉助理工程师在本书中的贡献，其中，课题的部分成果形成王艳红硕士的硕士论文，李慧平硕士完成的第二章的撰写形成其硕士论文的一部分，李蓉助理工程师完成部分数据的处理和表格绘制及近三万字的撰写。当然，本书引用了很多参考文献，这些参考文献的诸位作者的辛勤劳动，为本书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站在别人的肩膀上，让我看得更远。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的臧玉兰、左凌涛两位编辑的大力支持，在此表示诚挚的谢意。所有这些衷心的感谢都会化作我以后人生道路上的动力，不断前进。

由于作者的水平有限，书中难免存在错误和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批评、指正，作者的联系方式为：jiangmanlin@126.com。

作者^①

2018年初夏

^① 作者简介：蒋满霖，1974年生，金融学博士，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副教授、研究生导师。

目 录

1 导 论	1
1.1 研究背景	3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7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8
1.4 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	29
2 金融包容与城乡居民收入的理论基础	32
2.1 金融包容理论	32
2.2 城乡收入差距理论	39
2.3 金融包容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机制	42
2.4 金融包容、金融排斥、区域金融竞争力和金融发展之间的逻辑	47
2.5 农村金融生态理论创新——“金字塔三分图”	56
2.6 普惠金融理论	73
2.7 农村金融包容和金融生态的核心是制度创新	80
3 国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	84
3.1 农村建设的模式	85
3.2 农村金融制度	89
3.3 政府行为	96
3.4 国外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	100
3.5 对我国的启示	120
4 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现状分析	130
4.1 广西金融包容发展的现状分析	130
4.2 湖南金融包容的现状分析	140

4.3	普惠金融的缺失——三重二元金融结构	144
4.4	基本现状分析	158
4.5	低水平均衡制度性根源	174
5	金融包容水平和城乡收入差异的实证分析	177
5.1	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村经济增长的实证	177
5.2	基于基尼系数视角的广西城乡收入差距实证	187
5.3	广西金融包容水平的测度	194
5.4	广西城乡收入差异的测度	201
5.5	广西金融包容水平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	207
5.6	湖南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异测度	214
5.6	广西和湖南的金融生态测度	233
6	提升金融包容的制度创新框架	258
6.1	实现功能性的农村金融制度创新，构建普惠的包容性金融	259
6.2	促进物种多元化的农村经济制度创新	270
6.3	构建高水平均衡的农村金融生态生境的制度创新	276
7	结论与展望	286
7.1	结 论	286
7.1	研究的几点主要结论	287
7.2	研究的不足和进一步思考	289
	参考文献	291

1 导 论

农业丰则基础强，农民富则国家盛，农村稳则社会安。有 5000 年历史的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农业大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为了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需要，政府一直维持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体制和城乡差别的发展战略，农业被安排承担起了原始积累的重任，农民被限制在农村里、土地上，终于渐渐形成了“三农”这个今天谁也无法回避的超越经济的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也成为“三弱”问题（农民是弱势群体，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地区）。当前，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由“三农”问题又衍生出“农民工、失地农民和农地”这一“新三农”问题^①。怎样解决这千百年来的难题？在笔者看来，如表 1-1 所示，“三农”外延很广。故必须寻找一种新的思路来诠释中国的“三农”问题。

表 1-1 中国“三农”问题的外延

农民问题	农村问题	农业问题	粮食问题、农业竞争力问题、产业化问题等
		其他问题	小城镇建设问题、村民自治问题、乡镇政权调整问题、农村公共服务问题、农村金融问题、农民税费改革问题等
	其他问题	土地产权界定与保护问题、精神文明问题、农民增收问题、农民负担问题、扶贫问题、户籍改革与农民流动问题、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新农村医疗保险问题、农民人力资源问题等	

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是当前新时代中国农村发展的两个“关键词”^②。中国

① 全书将“农业、农村、农民”简称为“三农”。其实，在中国大多数地区，农民很穷、农村很苦、农业很弱的现象还普遍存在。当然，世界经济实践的证明，一个国家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客观上承担了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积累的任务；当工业化和城市化达到相当程度后，还具有支持农业的能力。

② 2018 年 2 月，新华社发布改革开放以来第 20 个、21 世纪以来第 15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4 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文件题为《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直是世界减贫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有力推动者。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为中国农业农村的现代化描绘了美好蓝图。2020年之后，中国的扶贫重点要从目前的精准扶贫，即让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转向缓解农村的相对贫困问题。要让农村公共政策的红利更多地流向低收入人群，这是2020年之后的一个挑战，也是一个奋斗目标。其实，这更多是一个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2018年恰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目前，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仍然比较凸显，表现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均衡，也是十九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①。由此，本书重点选取了我国西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和中部的湖南省两个农业大省为样本，从金融包容的视角，通过优化金融生态，提升区域金融竞争力，实现普惠金融的常态，勾勒破解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途径。

① 准确判断与把握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发展变化，是一个国家制定正确方针政策理论依据，是化解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前提，是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也是十分重要的一条历史经验。事物是运动的，矛盾是发展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间，在不同历史发展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先后经历了四次重大转变。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土地改革完成之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之间的矛盾。从1953年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阶段。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因为历史原因，这一科学判断没能得到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重新正确认识我国国情，毅然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变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作了规范表述：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直到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相关表述都未发生实质性变化。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以政治家的为民情怀、思想家的高瞻远瞩、改革家的责任担当、理论家的胆识气魄，站在时代发展的高度，深刻把握中国的基本国情，敏锐地洞察到了社会主要矛盾已然发生的深刻变化，进而得出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

1.1 研究背景

“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2003 年温家宝总理引用唐代诗人白居易的诗句来表达他对“三农”的关切之情。1978 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起步，并进而向城市推进。40 年来，中国农村在为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自身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业持续快速发展，农村社会面貌发生巨大变化，农民人均收入由 1978 年的 133.6 元增加到 2017 年的 13 432 元，“三农”发展成绩举世瞩目。然而，我们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翻天覆地”之下，农民增收难，农业基础薄弱，城乡收入差距、城乡发展不均衡凸显（见表 1-2、表 1-3）中国共产党一直关注“三农”问题，邓小平同志早在 1978 年就率先提出对农村进行改革，以解决占总人口 80% 的农民的吃饭问题。2018 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又是“三农”，这是 21 世纪以来第 15 次将一号文件锁定于“三农”。这到底为什么？思想的突围带来实践的突破。在全球金融经济时代，“三农”问题实质上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结构变革和社会转型问题，带有某种普遍性，几乎各国在工业化的历史进程中都会遇到这一问题的困扰和挑战。

表 1-2 2001—2017 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变化情况

年份	城镇居民 纯收入（元）	农村居民 纯收入（元）	城乡绝对 差距（元）	城乡收入比
2001	6860	2366	4494	2.90 : 1
2002	7703	2476	5227	3.11 : 1
2003	8472	2600	5872	3.26 : 1
2004	9422	2936	6486	3.21 : 1
2005	10 493	3255	7238	3.22 : 1
2006	11 759	3587	8172	3.28 : 1
2007	13 786	4140	9646	3.33 : 1
2008	15 781	4761	11 020	3.31 : 1
2009	17 175	5153	12 022	3.33 : 1
2010	19 109	5919	13 190	3.23 : 1
2011	21 810	6977	14 833	3.13 : 1
2012	24 565	7917	16 648	3.10 : 1

续表

年份	城镇居民 纯收入（元）	农村居民 纯收入（元）	城乡绝对 差距（元）	城乡收入比
2013	26 955	8896	18 059	3.03：1
2014	28 844	9892	18 952	2.92：1
2015	31 195	11 422	19 773	2.73：1
2016	33 616	12 363	21 253	2.72：1
2017	36 396	13 432	22 964	2.71：1

资源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表 1-3 1981—2007 年中国基尼系数

年份	基尼系数	年份	基尼系数	年份	基尼系数
1981	0.273	2004	0.473	2011	0.477
1990	0.316	2005	0.485	2012	0.474
1995	0.376	2006	0.487	2013	0.473
2000	0.417	2007	0.484	2014	0.469
2001	0.490	2008	0.491	2015	0.462
2002	0.454	2009	0.490	2016	0.465
2003	0.479	2010	0.481	2017	0.464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网站。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统筹城乡发展，全面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和和谐发展。所以说，乡村振兴建设重心虽然在农村，但获益的并不仅仅是农民，其有巨大的正外部效应。在笔者看来，这是中国农村第五次制度变革^①。作为有着深厚而悠久的小农农耕文明，长时期城乡二元分割，目前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之中的发展中大国，如何统筹城乡发展，使农民能够合理分享经济社会发展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村制度有了四次大的变迁。每一次变迁都对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第一次制度变迁：土地革命。这极大地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为中国由农业国走向工业国清除了根本性的社会制度障碍。第二次制度变迁：农业合作化运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合作经济。第三次制度变迁：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内容的农村改革。其最大的绩效在于突破了计划经济模式，这是整个中国经济改革的起点。第四次制度变迁：农业产业化经营。这实现了在分户经营基础上的农业规模化、集约化经营。

的成果,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破解“三农”难题,不仅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也是21世纪人类社会的伟大实践。

农村改革既是中国整体经济改革的时间起点,也是经济改革的逻辑起点。在中国,作为多功能的农业,几乎被单一化为产业部门,就不得不走上与二、三产业同台打擂的悖论,从而导致了农民成为弱者,农村成为弱势,农业成为弱质^①。事实上,从国际经验看,粮食的第一属性是生存必需品;第二是战略品;第三是国家公共产品。这对于拥有13亿之众的中国来说更是如此。中国的农业贡献已不仅仅限于人们常常提及的经济贡献,实际上农业贡献已体现到了经济、社会、生态、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之中^②。当然,现代化进程就是一个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农业、农村和农民”是以自然萎缩直至消融的消极方式融入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之中。然而,自然而消极的方式显然不能适用于解决人口巨大的中国的“三农”,仅就占人口总量2/3多的农民数量这一项指标,就是其他国家从未有过的挑战。如孟德拉斯(Henri Mendras)所说:“一个农民占50%的国家和一个农业劳动者占人口10%的国家当然有本质的不同。”^③

“三农”的核心是农民,当农民作为一种职业时,农业与农民产生了联系,同样的当农民作为代表居住生活在特定地理环境中的人群,农村与农民联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农业”和“农村”问题是作为农民生存的具体载体的附着其上的次生性问题。因此,仅仅用经济眼光难以发现中国“三农”的根源,而这更多的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的综合体。

当然,经济、法律和道德是构成一个社会最基本制度的重要支撑。新中国成立以来促成几次农业大发展的关键因素并非大量的经济投入,而是制度创新。在今天,统筹城乡发展,建设新农村,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加大对农村的经济投入固然重要,但这种支持更应体现在对农政策的松绑和制度

① 农村金融更多是政策性的。曾建中(2006)研究认为,现实表明,我国的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一直是向着使农村正规金融机构商业化方向推进的,其结果是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明显趋于减弱,农村金融主体供给不足。

② 农业多功能性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日本提出的“稻米文化”;认为日本文化与水稻种植密切相关,提出了水稻种植的文化等功能。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正式采用了农业多功能性提法。1996年世界粮食首脑会议通过的《罗马宣言和行动计划》中明确提出将考虑农业的多功能特点,促进农业和乡村可持续发展。1999年9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荷兰政府在马斯特里赫特专门召开了100多个国家参加的国际农业和土地多功能性会议;同年,日本颁布了《粮食·农业·农村基本法》,以立法形式确立了发挥农业多功能作用的新概念,强调农业除具有经济功能外,同时还具有社会功能、生态功能和政治功能等多种功能。

③ [法]H. 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的创新上。因此,农村金融生态的根本问题在于制度创新^①。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明确地指出:“制度重于技术。”^②

广西地处华南地区,作为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之一,广西的少数民族人口总数居全国第一位。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广西居民收入得到显著提高,但与此同时,在“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非均衡发展策略下,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如今趋势虽然有所缓解,但仍不容忽视。2014年广西全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683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669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2.84倍,若将城乡人口所占比重及各种社会保障因素计算在内,这一差距会更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会阻碍经济的协调和可持续发展,也会给社会稳定带来威胁,在此背景下,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课题。

金融作为经济的核心,在要素流通和资源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中应重点考虑。广西金融一直保持稳定发展,存贷款规模持续扩大,存贷款总额分别从2004年的3740.6亿元、2786.8亿元增长到2015年的22800亿元和18100亿元,年均增长16.26%和16.88%。金融机构规模不断扩大,金融机构网点数量从2004年的5602个发展到2015年的6174个,从业人员从67792人增长到91431人,金融服务的渗透性逐步提高。

金融包容对促进经济增长,促进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城乡收入差距的改善具有积极影响。在2005年“国际小额信贷年”上,联合国首次提出金融包容这一概念,倡导通过建立包容性的金融体系帮助低收入群体获得金融服务,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焦瑾璞(2006)则首次把金融包容这一概念引入中国,提出所有群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都有应该有机会获取并使用金融服务。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发展普惠金融中所涉及的群体重点在农民、小微企业(特别是新设创立小微企业)、城镇低收入人群和其他特殊群体。因此,在广西这样一个集“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山区、落后”等于一体、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70%的地区来说,利用金融包容来解释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有着更深

①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的改革、发展是从两个层面上展开的,一是以政府推动为主的自上而下的制度演进;二是以农民为主的自下而上的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政府推动的一系列体制机制转变大体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范畴,以农民为主的群众创业活动所形成的制度安排,大体属于诱致性制度变迁范畴。

② 具体参见吴敬琏教授专著《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

刻的现实意义^①。

为了探讨金融包容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具体效应和影响,本书在总结前人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了广西和湖南金融包容水平发展的实际情况,利用 2010—2015 年的数据,通过构建金融包容指数来测量金融包容水平并进行横向和纵向比较,与此同时,利用面板数据对金融包容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就此提出合理地发展包容性金融体系、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建议。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自从金融生态概念在中国产生以来,国内很多学者抱以极大地热情。民之所望,政之所向,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2018 年恰是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十三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民亦劳止,汔可小康。”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一个民族都不能少。正如《“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指出:由于历史、资源禀赋、区位条件、基础设施等诸多因素制约,贫穷落后、区域发展不均衡、城乡收入差异凸显,特别是金融服务的不均衡,仍是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问题。由于贫困人口分散,贫困程度深,贫困面大,传统的以地理区域等扶贫方法已经不再适合于解决民族地区的严重贫困。因此,研究“历史交汇期”下在民族地区向深度贫困地区聚焦发力,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和社会意义。那么,扶贫攻坚最为关键的着力点在哪?

1991 年,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26 年后的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金融活,经济活”的精辟论述。由此,本书拟选取我国西部的广西和中部的湖南作为研究对象,创新性地从金融包容的视角剖析地区城乡收入差异的根源,通过制度创新优化金融生态,以期找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经验,实现全国全面小康。

① 中国目前属于三重二元金融结构,距离普惠金融目标要求还比较远。所谓三重二元金融结构,是指正规—民间金融、城市—农村金融以及国有一—民营金融。在这种格局下,农村边远贫穷地区、分散农户、小微企业和社会低收入人群的金融服务可得性尤其差。

1. 理论意义

在对金融包容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后,笔者认为在这一领域仍有发展和完善空间。首先,当前研究金融包容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文献仍然很少,且以国家宏观层面研究为主,缺乏以单个省份为研究对象的分析。其次,当前研究多从定性的角度研究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定量分析的文献相对较少。最后,不同文献所使用的测度金融包容水平的指标存在混乱,指标的选择更依赖于作者的主观判断,缺乏客观性,最终使得金融包容对经济的具体效应没有达成一致意见。本书以广西和湖南为例,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发展现状。然后以金融包容为研究的切入点,运用多维度的指标测度城乡不同的金融包容水平。之后通过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异关系的研究,为金融包容能够促进收入增长和缩小地区差异的效应提供理论上的证明,也为其他地区解决收入差异问题提供借鉴。

由此,本书在理论上探讨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异的关系,对金融包容主要依托的空间形态和最终目的之间的作用机制进行探讨,研究中西部民族地区金融扶贫的对策和路径,对进一步丰富空间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农村金融学、金融扶贫等学科研究的理论内涵并为之提供研究案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课题也很好地诠释了新时代有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学,为破解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供路径。

2. 现实意义

时代是出卷人,人民是阅卷人。《“十三五”促进民族地区和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和2017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把民族区域精准脱贫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在“历史交汇期”下,我们如何实现民族地区的全面小康?正如李克强总理所提出的对改革开放40周年最好的纪念就是要在改革开放上有新作为,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本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探究金融包容对促进收入增长及缩小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并提出了优化金融生态的制度创新,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框架,对解决中西部民族地区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全面小康具有十分重要的决策参考价值。

1.3 国内外研究动态

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始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

间的关系研究,因此本部分首先就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理论进行综述,进而整理了金融包容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成果,进而也对目前的金融包容水平的测度方法进行了梳理。同时,也对金融生态、区域金融的相关研究进行梳理

1.3.1 金融包容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理论梳理

1. 金融包容的概念

国外学者较早时候就对金融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以及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McKinnon (1973) 和 Shaw (1973) 提出了金融抑制 (Financial Depression) 和金融深化 (Financial Deepening) 理论,致力于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Clarke 等 (2003) 以私人信贷 (Private Credit) 作为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结合 1960—1995 年 91 个国家的数据,分析了金融发展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Kim 和 Lin (2011) 以私人信贷 (Private Credit)、流动性负债 (Liquid Liabilities)、银行资产 (Bank Assets) 作为金融发展的代理变量,基于 1960—2005 年跨国面板数据研究了两者的关系,结果表明在金融发展的各个阶段,收入差距呈现阶段性特征:在金融发展的成熟阶段,金融发展可以有效地缩小收入差距。但金融发展水平不能仅通过单一维度来衡量,还要关注金融体系的其他维度,如覆盖面、金融服务成本等,金融包容则恰好从多维度测度了金融体系。“金融包容” (Financial inclusion) 一词源于“金融排斥” (financial exclusion),在概念上起初被认为只是金融排斥的简单消减,进一步研究的金融包容的内涵和范围则更为深入。威尔士议会政府 (WAG) 将金融包容定义为不论收入水平或社会地位,每个人都可以接触到合适的金融产品、服务以及有效管理资金。里根与帕克斯顿 (2005) 则将金融包容的研究视野拓展到第二层次,他们认为完整的金融包容概念应包含两个层面:需求宽度 (Breadth) 与参与深度 (Depth)。Ardicetal (2011) 也认为金融包容的内涵包括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和金融服务的使用两个方面,前者取决于金融服务的供给,特别是金融机构营业网点和 ATM 机的分布和密度,后者由供求两方面因素决定。国外关于金融包容的研究,主要从研究对象、评价指标、研究方法几个方面展开。就研究对象来说,早期金融包容以微观为主,侧重于对个人银行账户的分析,后来发展到以宏观为主并宏微观兼顾,如 Sarma (2010) 通过利用世界上 49 个国家的数据对金融包容水平的排序和比较,得出高收入水平的国家金融包容水平相对较高,金融包容水平与人均